

毛泽东与中国革命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

编辑组编译

国外研究



毛泽东与中国革命

〔加〕 陈志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
编辑组编译

(内部发行)

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与中国革命

MAOZEDONG YU ZHONGGUO GEMING

〔加〕 陈志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

编辑组编译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北京 1740 信箱)

新华书店发行 昌平马池口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32 开 11.5 印张 261 字

00,001/10,000 册

1993 年 4 月第一版 1993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73-0121-4/C·9 内部发行 定价 6.30 元

丛书出版说明

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毛泽东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国外许多学者根据各自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出版了数以千计的论著。

为帮助国内学者了解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状况和动态,为使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向新的深度和广度发展,并在对外宣传中有针对性地阐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我们决定编译《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供有关研究人员内部参考。

这个选辑以丛书形式出版,主要选编有学术参考价值的资料;以提供原始资料为主,其中既有专著,也包括论文汇编;既有全译的,也有节译的。形式根据编选内容而定,不强求一律,编者只作必要的编辑和评注工作。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力求比较客观、系统地反映国外多年来有代表性的观点,并希望能够起到开拓理论视野、扩展思维空间、促进学术交流的作用。

本丛书编辑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理论组主持,主编石仲泉,副主编张宁,有些译本邀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译组和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室以合作方式参加工作。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

1992年6月

第八辑编者的话

60年代中期,西方开始出现一股“毛泽东研究”的热潮。在此期间,一批在西方学术界具有奠基性质的重要著作相继面世,陈志让教授撰写的这部《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便是其中一种。此书依据丰富的文献史料,较早地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背景、过程及毛泽东个人的经历和思想作出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因而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情况若明若暗的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影响,几乎成为西方毛泽东研究学者必读的基础著作。虽然此书出版于1965年,作者还无法掌握一些当时尚未披露的重要资料,但鉴于书中的某些重要观点和方法已融入西方毛泽东研究的传统,现在翻译介绍此书,有助于国内学术界追根溯源,更全面地了解西方毛泽东研究的学术传统。

陈志让教授是一位知名的加籍华裔学者,早年就读于昆明西南联大,1956年在美国利兹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从1971年起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约克大学任历史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西方关系等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和西方学术思潮的熏陶,使陈志让教授在研究毛泽东方面具有其他西方学者难以比拟的优越条件,很少受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隔膜的限制。

作者开始从事这项研究时,美国学术界关于“毛主义”问题的论战已经爆发。作者倾向于哈佛学派的观点,认为在中国革命

中确实存在着具有独特性质的“毛主义战略”，把握并揭示这种特点是研究中国革命和毛泽东的关键所在。但他同时又发现，西方学者虽然认为毛泽东的主要创新是其对农民的依赖，却又忽略了对以农民为基础的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建立作出具体详尽的论述，这势必使研究工作难以深入，往往搁浅在抽象的概念和文字之争上面。作者主张，对“毛主义战略”独特性问题的研究不能拘泥于文字，而应注重其实际内涵，这就需要进行历史的考察，把它“与毛泽东的个人经历、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及中国的革命战争联系起来”。可以说，作者在本书中实践了他的这种思路。体现在本书中的思路对后来美国乃至西方学术界的毛泽东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尽可能如实地再现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特殊社会背景及历史进程，作者充分利用他可以直接利用中文资料的优势，收集了丰富的文献史料，并力求进行客观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毛泽东截止到1949年领导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作出了比较详尽的描述。尽管书中的某些观点和方法尚可商榷，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比较扎实的资料准备工作，仍使我们感到这是一部有一定学术质量的著作，其参考价值并不因其出版年代较早而受很大影响。而且，在这套《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丛书中，也确有必要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一下外籍华裔学者研究毛泽东的情况。在这方面，陈志让教授的这本《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可以说具有一定代表性。

作者在书中引用了大量中外文献。对于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毛泽东有关著述的引文，我们尽力核对了中文版本，并将作者原注为《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的出处改为《毛泽东选集》1991年第二版的页码，以便于读者查阅。对于作者所引用

的包括港、台版本在内的其他中文资料,我们依据手头现有资料进行了核查,凡核查过的均以我们现有资料的文字为准并注明其出处,因资料不全而未核查的文字均系从英文译出。其他外文资料都是我们根据书中英文文字译出的。本书中译本系内部出版,读者引用书中文字务请核对原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理论研究组负责组织本书的翻译、校订和编审工作。承担本书编审工作的是石仲泉和张宁。参加翻译工作的有:张宁(绪言、前言、第1—3章)、龙平平(第4—6章)、薛历廉(第7—13章)。全书译文校订:张宁。具体编辑工作由张宁和张爱茹负责。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

1992年4月

目 录

绪 言	(1)
前 言	(3)
第一章 易受影响的年龄	(19)
第二章 动荡不安的岁月	(26)
第三章 广阔的地平线	(57)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者	(83)
第五章 第一次统一战线	(100)
第六章 秋收	(147)
第七章 革命根据地	(160)
第八章 五次围剿	(185)
第九章 长征	(214)
第十章 第二次统一战线	(231)
第十一章 战争与士兵	(271)
第十二章 胜利与谈判	(293)
第十三章 致命一击	(320)

绪 言

离开我把毛泽东作为政治、军事领袖来研究，并在伦敦地铁列车里用潦草的字迹在拍纸簿上写作本书的日日夜夜，已有三年多的时光了，但我作为一个作家对毛泽东的兴趣依然不减。与此同时，对毛主义的研究已成为蔚为壮观的大潮；只要翻阅一下霍华德·L·布尔曼的《七十岁的毛》（载于1963年10—12月的《中国季刊》），就会意识到当时有关其著作的研究有多么丰富多彩。1963年是多产的一年，这一年问世的有（我只提及其中一小部分）：《中国季刊》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专辑》（1963年1—3月），它考察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J·威尔逊·刘易斯的《共产党中国的领导》（1963年牛津版），它对党内精英阶层中权力使用情况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邹说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1963年芝加哥版），它阐述了那一时期中美关系的诸多方面；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还有斯图尔特·R·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3年蓓尔美尔版），它是对共产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关于毛泽东对历史的贡献，我本人的看法也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我过去始终认为，他的革命战略是最为重要的，但现在却倾向于把他视为这样一个人物，他成功地在中国建立了稳定的国家组织，从而结束了在文化帝国衰败与人民共和国崛起之间那个漫长的中断时期。在其他地方我将详细地阐释这一观

点。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涉足于毛主义研究的历程可以成为我对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环节。

自 1963 年以来,人们可以接触到一些重要的文献资料了。其中有“陈诚档案”,包括在三十年代反共战争期间缴获的小册子和其他材料,以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的记录最有参考价值。由于时间不够,也由于手懒,我没有依据这些材料对本书加以修订。既然本书无意成为定论之作,因此,除作少数更正外使它保留第一次出版时的面目,并不令我感到羞愧。

陈 志 让

前 言

“毛主义”这一术语，是西方人，或更准确些说，是哈佛的学者们为了方便而随手创造出来的。费正清教授、C·布兰特教授和B·施瓦茨教授的著述曾对这一术语作出过定义。但威特福格尔教授认为，这不过是个神话，是个他的哈佛同事们并未揭示其属性的传说。他们的定义是有益的，而威特福格尔的观点则有失公允。他的研究过于拘泥于文字，而不注意实际。也就是说，看不到施瓦茨教授的兴趣在于“毛对〈毛主义〉战略的探索”是没有道理的。

直至今日，西方学者总是倾向于认为，毛泽东的主要创新是他对农民的依赖，但同时“对以农民为基础的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建立”却不去加以说明。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及其历史学家则认为，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略问题的著述是其著作中的精华所在。的确，胡乔木和何幹之^[1]甚至说过，“以武装斗争的方式首先在农村发动革命，建立根据地，增加其数量，扩大其规模，然后包围并最后夺取城市”是中国革命的“规律”。他们以及中国的其他作者曾经克制自己，不把毛泽东的理论表述为“毛主义”。取代这种称呼，他们把这些理论称之为“毛泽东思想”，以此表明，在个人姓名之后加上“主义”的荣誉应当只属于诸如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类比较基本、比较系统的学说。

到现在为止，对毛主义的研究还不曾与毛泽东的个人经历、

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及中国的革命战争联系起来。然而，所有这些因素之间的密切联系是不能否认的，我始终特别注重给予这些因素以足够的重视。但在这一方面，我所做的不过也只是个开始，知识方面的局限以及得不到某些原始资料，使本书在任何意义上都难以成为明确的定论。

尚未回答的问题

除其他方面之外，本书意在展示毛泽东对种种问题的透彻理解和熟练处置，以及他在言论和行动方面的卓越表现。他在共产党变化无常的命运中把这个党团结起来的方式，他为怀念长沙、柳亚子和“不朽者”而奉献的诗词，表明他能成为一个可靠的朋友，但他对敌人和反对者的无情斗争也表明，他作为一个敌人具有令人生畏的品质。在内战的最后一阶段，他一再指示他的军队要“彻底消灭反动势力”，⁽²⁾“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国民党反动派”。⁽³⁾他告诫他的同志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⁴⁾“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⁵⁾对他的敌人，他绝不给任何仁慈，只有下述这类的讽刺挖苦：

过去的“剿共十年”并没有“剿”出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难道还想来再试一次吗？不错，“剿共十年”“剿”出了一个“一党专政”，但这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而在“剿共”四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之后，就已经“剿”出了一个“满洲国”；再加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就把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剿”进中国本部来了。如果有人还想从今日起，再“剿”十年，那就已经是新的“剿共”典型，同旧的多少有

点区别。但是这种新的“剿共”事业，不是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奋勇担负起来了吗？这个人就是汪精卫，他已经是大名鼎鼎的新式反共人物了。^[6]

毛泽东的生活俭朴，他对部下兄弟般的仁慈，符合中国在领导或亲情方面传统的理想；然而，也存在一些他强烈反感的工作作风和习惯。他对“烦琐的礼节”^[7]和“自吹自擂”^[8]都很讨厌。在《反对自由主义》中，他批评了这些不良习气：

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9]

从1927年以来，他从未允许自己陷入如下这种糊涂状态之中：“以百分之七十的精力扩大地盘，以百分之二十的精力对付国民党政府，以百分之十的精力同日本人作战。”^[10]对于那些学习了国外的东西但却没能获得批判地思考问题的能力的人，他说：

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11]

关于学习的内容，毛泽东肯定是个功利主义者，他没有耐心去学那种没有实践价值的东西。他把知识比作箭，嘲笑那些“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的人。^[12]毫无疑问，毛泽东知道怎样运用他的知识。他的分析力量、敏锐判断和好斗的固执造成了他在政治上的杰出表现。^[13]

虽然他早在1919年二十岁时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直到

1927年之前,他并没有拿起武器反抗当局。在二十二年的时间里,他不屈不挠地战斗着,经过了1934年至1935年的失败,长征,统一战线,内战,直到最后胜利。维持权力,部分是由于国民党凶残的迫害,部分是由于仇恨,这种仇恨是毛泽东人格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有些人把毛泽东的强烈仇恨归因于他在父亲那里受到的严厉对待,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早年阅读《水浒》之类小说所引起的。我却想,可以在他所读的达尔文、卢梭、穆勒和泡尔生的著作中找到这种仇恨的根源,这些书开阔了他的视野,鼓励他抛弃陈旧的传统。尔后,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文献揭示出他的民族怎样才能得到解放。他自己对于不公正、贫困和无休无止的内战的观察和体验,进一步增强了他的满腔义愤。对于他那种固执的仇恨,不可能再有其他合理的解释。如果不是孜孜不倦地想要找到一条结束这种状况的道路,没有人能够维持这种仇恨。毛泽东的仇恨使他目光敏锐,能够超越他如此憎恶的东西展望一个新的中国,他要创立的这个中国将是独立、自由、和平、统一的,并首先是繁荣富强的。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14]

或者是:

一唱雄鸡天下白。^[15]

这不是什么新东西。在19世纪60年代和以后的年代里,建立一个繁荣强盛的中国的要求一直不绝于耳。区别只在于实

现繁荣和强盛的方式。自强运动的第一批领导人^[16]提出了中国国防的现代化——“船坚炮利”；第二代人^[17]给这个药方里加上了经济繁荣。然后便是 1894—1895 年中日战争以及中国耻辱的失败，使自强政策声誉扫地。但是，这些政策的终极目标并没有发生变化。第三代人^[18]把行政改良置于优先位置，目标是把中国的专制制度改造成立宪君主制度；这也失败了。孙中山和蒋介石代表第四代人，他们分别在 1911 年和 1926—1928 年领导了他们的革命，希望通过革命实现共和，它既是民主的，又符合儒教传统。蒋介石是在俄国革命后掌握政权的，当时又正逢世界经济萧条，连年内战，共产党的挑战和日本人的侵略不断地中断蒋的政策实施。1945 年在盟国帮助下打败日本，意味着中国在五十年间第一次摆脱掉其侵略性的邻国纠缠不休的阴影，但也正在这时，“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发展到构成威胁的规模，以至无论是蒋介石的军事实力还是他的意志力量都不足以驱除她了。蒋介石的离去和毛泽东的就职并不意味着中国政策的直接目标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在 1949 年所要求而且至今还在追求的，仍是一个强大、繁荣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代表着一个世纪之久的自强运动的新的一代。

与自强运动平行发展的是中国农民运动的潜流，它始于蹂躏了南半个中国四年的太平天国起义，接着便是 19 世纪最后十年间的捻军起义和义和团运动。所有这些造反者^[19]都不相信政府具有实行其使中国繁荣富强的允诺的能力。太平军和捻军要求推翻满清政府，以他们自己的政府取而代之，以便结束社会不公正，并使国家获得一种比较坚实的基础；相信魔力的义和团竭力在中国驱除外国势力。这些起义者遵循农民造反的传统模式，以贫苦农民作为主要的支持者，在一块或几块基础区域内进行

长期的军事斗争。^[20]毛泽东也在一块或几块革命根据地依靠贫苦农民开展反对当局的长期战争。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是新一代暴动农民的领袖。

但是,由于毛泽东是一位试图通过把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条件以使其国家强大的马列主义者,他与自强运动的领导人和以往的暴动农民都不相同。在他看来,中国只有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才能实现繁荣强盛。^[21]他相信,使中国得到解放的唯一强大力量,只能是在理论上得到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支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但在实践上,这种支持主要来自农民,特别是武装起来的农民。由于依靠农民,据说他有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但是我将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化的共产主义的最大贡献,是为实现马列主义目标而采用了中国农民造反的传统模式并围绕这一模式提出了一整套战略和战术。

这里我必须承认,传统的农民造反同毛主义革命模式之间的确切关系,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对此作进一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我自知没有对此提供一个完整的答案。

因为毛泽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在另一种意义上也不同于中国其他的革命者。他的革命实质上是军事斗争,但也具有深远的文化内涵。1911年以前的改良从火器开始,扩展到工业和铁路,最后提出了立宪的要求。1911年和1926—1928年的革命,目标是民主共和制,它们完成得太快了。它们把许多机会主义分子吸收到革命队伍中来,以至这两次革命都丧失了它们的社会意义。从另一种观点看,人们可以看出,在改良和革命过程中,中国怎样借鉴西方。这种借鉴先是武器,尔后扩大到机械和运输手段,最后是政治的和立法的制度。甚至革命模式也是从法国和俄国学来的。改良者和革命者都感到人才的宝贵,但

是，除了派人到国外留学，他们似乎都未意识到制定训练干部的适当政策的重要性。没有训练有素、清正廉洁的干部充实中下级政府部门，无论具有多高尚目标的革命都难免会失败。在这方面，毛泽东从斯大林和俄国党那里学来了训练干部的政策。此外，由于毛泽东依赖的是政治上落后的农民，他必须找到种种唤起他们的方式，诸如重新分配土地和减租减息。因此，他攻击土地所有者阶级的既得利益，从而实际上摧毁了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

毛泽东的社会革命并不就此止步。他是个男女平等主义者，主张妇女与男人平等，期望她们在生活中享受平等的待遇。^{〔22〕}他对科学本身虽然没有很多理解，但却充分意识到科学的价值。他认为，文学和艺术应当为人民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而且中国人应当有选择地向其他民族学习，抛弃“不合需要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他倡导洋为中用，但反对“全盘西化”。^{〔23〕}借鉴来的东西必须“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24〕}他本人曾赋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以民族形式，并希望其他人在科学、文学和艺术方面也这样做。

要充分理解毛泽东关于人际关系和礼节的看法，必须对中国的共产主义法律有更多的了解，而这正是我在本书中没打算给予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民族形式不能没有国际内容，毛泽东本人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

这样看来，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25〕}

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不能不引